

消失的粟特人

——沿着玄奘的足迹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盗图”，画中胡商即为粟特人的样子

□ 邵学成 严梦阳

今年9月份，9位宗教考古美术专业的同仁组成乌兹别克考古美术考察团，对乌兹别克从希腊化时期到帖木儿王朝的一系列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团从北向南数次穿越崇山峻岭和军事检查站，沿着古代玄奘的西行路线，抵达阿富汗与乌兹别克边境。

在撒马尔罕的田野上

撒马尔罕让人沉醉，这个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承载了太多的记忆。该城位于中亚咸海的两大支流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古称索格底亚那，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曾东征于此，而那“最远的亚历山大城”正建立在这片土地之上，成为千年不朽的传说。

这里也印刻着我们中国人过去伟大盛世的背影。唐代的撒马尔罕还是粟特人建立的城市。如果按照中国传统史料仔细来区分，该地区有安国、康国、米国、石国等数个较大的绿洲国家，史称昭武九姓，大唐帝国的西北部边陲正由他们所镇守。而九姓国家中最大的康国所在地正是撒马尔罕，相传，许多康姓中国人的祖籍正是这万里之外的中亚城市。

康国的命运却是不佳的，唐朝中后期，中国对西域的控制已经力不从心。751年怛罗斯一战，唐朝惜败于阿拉伯帝国，华夏民族的心态也逐渐从开放走向内敛。而被唐朝羁縻的康国也在风起云涌的伊斯兰化浪潮中告别了自身的琐罗亚斯德信仰，曾频繁活跃在欧亚大陆上的粟特商人的身影也日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突厥人和蒙古人，出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故事。

而冗长的历史抵不过当下凉爽的秋风。下午我们一行人到达阿弗拉西比博物馆，参加了粟特大使厅壁画修复开幕仪式。这是怎样的一个大使厅呢？

大厅的北墙上是中国皇帝狩猎图。远在亚洲腹地的西域文化中心看到了故乡的人物风俗画，不免让我们这些中国人感到兴奋与安慰。壁画描绘的是唐高宗在骑马狩猎，高宗跃马而起，手持长矛向下刺向扑面而来的猛兽，尽显雄武之姿。西墙是大使们的朝会，也是中世纪万国来朝的盛会。突厥可汗（一说是康国国王）正襟危坐，台下的各国大使鱼贯而行。唐人、高丽人、吐蕃人、突厥人轮番登场。南墙绘制的是石国国王的出行图，国王骑着高头大马，身穿华服、手持战斧，头顶戴着象征权力的日月王冠。转到东墙，是印度文化的范畴，东墙有螺旋式的构图。描绘的是印度大神克里希那的童年史诗，克里希那自由地生活在耶木拿河畔，身旁的小爱神卡玛张弓搭箭，暗示了克里希那与牧牛女的罗曼史。整套壁画一气呵成，将当时欧亚大陆的几个重要政权全部纳入其中，大唐、突厥、粟特、印度各占一墙。这既是宏大的文明盛宴，也显示了与众多大国为邻的小国的生存智慧。

一位老同志回首这段生活时，激动不已地说：“人世间最艰苦的日子我们经历了，生离死别最痛的时刻我们经历了，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对后人说，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挺身而出，付出了能付出的一切。”为纪念这段豪情岁月，纪念这些人，纪录片《北平以北》拍摄完成，已于12月8日上映。

□ 曹颖新

勇赴国难

1933年初，伪满洲国成立，日军侵略势力由白山黑水逼近华北。山海关的陷落使华北大地如亡国之岬呈现在日军面前，紧接着，日军围攻热河，当地驻军迅速溃败，热河沦陷。南京政府一直寄希望于通过谈判和外交手段与日本交涉，在这些工作进行的同时，也在长城沿线组织布防。此时，让日军震动的是，在长驱直入的势头下，他们在长城遭遇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古老长城烽火重燃。在冷口、喜峰口、古北口，中国军队用白刃肉搏的方式，浴血抗敌，重创日军，二十九军从此声震华夏，大刀曲的旋律响彻南北。虽然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牺牲众多，但也打击了敌人嚣张的气焰，拉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同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吉鸿昌将军率领敢死队奋力激战，收复失地，结果却被南京政府定性为不服从大局。冯玉祥被迫辞职，刚刚收复的热河和察哈尔部分失地再次沦陷。

虽然形势恶劣，但长城抗战和察哈尔抗战的壮举激励了全国人民的心志，尤其激励着年轻学子的心灵。曾经活跃在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中，有些人是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在家国之悲面前，他们无心继续读书，毅然选择奔赴国难。家园失守，他们跟着抗日队伍转战至华北，同时在学生和民众间展开抗日动员活动。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而蒋介石仍然组织西北“剿共”武装，继续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此尤为愤怒，北平各高校学生联合起来，发表与华北

共存亡宣言，清华大学的蒋南翔发出了最悲愤的呼声：“华北之大，已经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12月9日，北平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这场运动中，就有当年活跃在抗日义勇军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抗日经验，很多人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二·九”运动中，他们不但组织学生进行抗争，还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积极筹划北平周边的敌后抗战，为建立敌后根据地积蓄力量。

挺进平北

从1935年至1937年，在北平以及北平周边的各个地区，以殖民统治、镇压抗日力量和防共为主要职能的伪政府相继成立。1935年11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成立，密云、怀柔、顺义、昌平四县沦陷；1936年2月，伪察哈尔盟公署在张北成立，张北、崇礼、宝昌、沽源四县沦陷；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后，日军占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在此组建伪察南自治政府，宣化、怀来、龙关、赤城、延庆等地沦陷。至此，伪热河、伪蒙疆、伪华北诸政权纷纷建成，在北平北部形成了一个三角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北平以北地区是华北抗战的关键所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组建的平西、冀中、冀东根据地已经建立并扎根。这些地区从东南北方向包围了北平，但是平北地区尚未建立根据地，如果不打通平北，山西、河北与察哈尔的根据地就不能联合起来。1939年2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八路军挺进军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同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在平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播下抗日火种；1939年2月，以第四纵队为基础，组建八路军

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之后，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挺进军第34大队挺进平北。随后，平北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起来，根据地包括丰宁、滦平、昌平、怀柔、密云、顺义以及崇礼、龙关、赤城、延庆、康保、宝源、张北、宣化、怀来铁路以北地区。在异常严酷的平北抗日中，诞生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队伍，这就是晋察冀军区第十团。

1939年初，王震写给冀热察挺进军司令萧克一封亲笔信，信中有道：“我这里有200多名平津流亡青年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年轻，有文化知识，领会党的政策快，会做群众工作，为首的叫白乙化，曾在东北‘讲武堂’学过军事。”萧克立即回信说：“欢迎白乙化率‘抗日先锋队’来平西。”3月，抗日先锋队来到平西，与冀东人民抗日联军编成华北抗日联军，承担了开辟平北根据地的任务。到了年底，白乙化领导的华北抗日联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这是八路军中特殊的“知识分子团”，他们大多是七七事变前后由平津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有很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在和平斗争不再有意义的情况下，他们选择投笔从戎，用年轻的生命谱写芳华。

英雄军队

1935年，重回学校的白乙化既是中国大学政治系的一名学生，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和同学们一起，在党的指派下，去绥远巴彦淖尔盟的乌拉山下发展革命力量。1937年，他们组织了垦区暴动，成立了以大学生为主的抗日民族先锋队，使抗日力量在绥西一带活跃起来。后来，白乙化和他的同学们转战平津，组成了王震说的抗日先锋队。在成为晋察

“日记”中的历史



□ 朱曦林

“日记”文献最早可溯源至西汉时期，此后经宋元两代的发展，至明清时期蔚然大观。就针对的阅读对象而言，日记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给自己看的；另一类是被当做著作，以作身后为他人阅读的。

历史进程中的“大人物”“小人物”

通过对同一时期、同一事件、不同身份的日记进行解读，可以体察历史进程中，不同人物的感受。如戊戌变法，唐烜和江翰就在日记中呈现出“不对等”的记载。是时，唐烜任职刑部，其日记又喜将所见所闻“悉缕述无疑”，故对京中时政多有记载。变法初起时，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898年7月18日）的日记中，他就记录了康有为受任用的过程，虽多有微词，却也承认“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至于“六君子”就义，在日记中，唐氏不仅以参与者、也以经历者的视角，详细记载了“奉口谕严拿康某”的过程、刑部关押判处“康党”的情形，并表达了他对变法“摇动人心、败坏风气”的否定态度。而江翰虽然与康有为、梁启超、

杨锐等人都有交往，甚至于戊戌年初，江氏尚与梁氏共饮、寄函杨氏，但在日记中对变法之事却未置一言。这除了因其日记“属日常备忘性记录，少有议论”外，“未有意识地记录论时务之事”而，可能与他不支持变法有关，在江氏少有的涉及时局的记载中，曾记录了曹元弼“痛诟康有为、梁启超及蒯光典”之事，其态度不难窥见。

又如辛亥鼎革，王振声和黄秉义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不同的感受。王振声是同治十三年进士，曾任会试同考官、监试官，徽州知府等，与一时政要载振、赵尔巽、铁良多有交集。他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捐升遗缺后，即奉调入京。鼎革之际，王氏虽已远离政坛，但在他简要的日记记载中却清晰地记录了从“湖北革党攻陷武昌省城”到“皇帝辞位，定为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时局变迁。其中，王氏最为切身的感受则是“江宁、江西、浙江均有警”“苏浙闽粤均无安报”“齐化门东直门内掠抢烧大乱”等混乱景象，于是在辛亥年底遂“携眷东避于乡”，在致信友人时更称民国“大局摇摇”“民不聊生”。有这样的感受，无怪乎在张勋复辟的当日，王氏即在日记中改用“大清帝国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记曰。

而远在台州的黄秉义对于辛亥革

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当时的报刊和友期间的交流。在辛亥年八月三十日（1911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他首次谈及对武昌起义的看法，认为“武昌彼据、汉阳彼占，深为可虑”，清廷应“水陆兼程并攻”。迄于清帝逊位，在近四个月的日记中，黄秉义“每月即记完一册，日均记逾千字”，除了根据报道作出对局势的判断外，他也在不断思考导致起义的原因，最终将矛头指向了张之洞，认为清廷“听信逆臣张之洞邪说，废科举、出洋游学、停书院，编设学堂，以致革命之贼处焉”，进而说“总而言之，‘停科举，瓦解人心；设学堂，倡言革命；练陆军，干戈倒击’二十一字致有今日之祸”。至民国肇始之日，黄氏更宣称“我朝之万世罪人在张之洞一人耳”。当然，黄氏的“一家之言”代表的是因科举的废除而丧失“读书——做官”之路的读书人，但他的记载中，其身边群体言及湖北战事，“革命党战胜，其色喜；官军战胜，其色忧”，则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南方世风的倾向。

“日记”中的生活

20世纪初，梁启超以“新史学”为倡导，批评中国的旧史只知道有朝廷

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提出历史研究应重视“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日记”作为记录个人经历的文献，涉及了著者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古代中国的城市生活中，居民的用水问题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王钟霖的日记中也有相关北京城内“水屋子”的记载，他在咸丰十年五月廿九日记道：“京中内外城官民所用甜水除自己有车自拉外，除皆水屋按时卖给，凡有水屋皆山东登州人，无论大风雨必须送到各门挨卖，他人不能有此长功夫，亦不敢卖，只成一霸。京中居民不下百万家，皆仰给此水车之水，亦多不肯得罪他，盖水屋各有分界，他处不能越送也。”这则记载，不仅有助于了解晚清时期北京城居民的用水方式、供给来源，也能丰富文献记载的类型。

科举考试是帝制时代的重要内容，举子的备考及落第后的心态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粟奉之的日记，就详细记载了他五次参加会试、五次落第，最终大挑考授四川知县的经历，展现了普通举子“皇皇北上，行囊犹虚”的赴考情境。同时，他的日记“凡有闻见志之，旁及士俗物产，以尽其变”，对赴考、宦游途中的舆地物情、风俗人文、商业变迁等多有记载。如游云南时，粟氏就记录了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西方列强的商品渐销内地，致使素以产玉著称的云南，“向时巨贾无一存者，真空受产玉之名，而生计坐是大减”，从而感慨道：“人第知洋人通商，夺细民职业，沿海受其害，乌知僻在西南之滇，害亦如之。”而后他赴蜀任职，在途中又亲见顺庆府盛产的红花，“其利为洋产所分，此业者遂寡”的情形，遂再次感慨：“洋人通商，事事攘中国之利，红花虽微，是可慨矣。”而从这些记载中，也不难看出当时西洋产品对普通民众原有生计的冲击。

（摘编自2017年8月9日《中华读书报》）